

## 中國近代小說研究的重要收獲 讀《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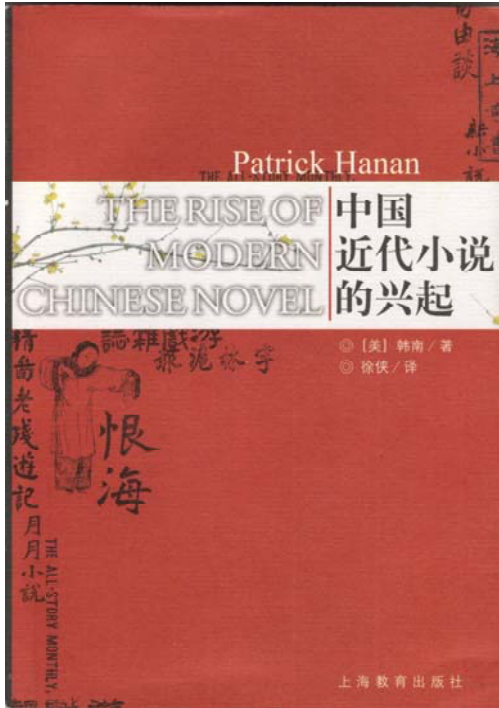
李 慶 國

美國漢學界的重鎮韓南（Patrick Hannan, 1927- ）教授\*1的近代小說研究論文集《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2去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翻譯出版。這是一部真正能令研究界同行欣賞和讚歎的近代小說研究論著，它給中國小說特別是近代小說研究界帶來了久違的驚喜。

記得最早讀到韓南教授的論文是他發表在《文學評論》二一年第三期上的談第一部漢譯小說 \*3。這篇論文對發表在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五年上海的文學月刊《瀛寰瑣記》上的長篇翻譯小說《昕夕閑談》的原作、原作者和譯者和進行了大量的求索和綿密的考證，最終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解決了一個長期以來在近代文學翻譯研究中懸而未決的疑案。因本人曾做過“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這一課題研究\*4，故對韓南教授的這一最新研究成果特別興奮，同時也深感汗顏。這次能夠較系統地閱讀他多年來在近代小說研究領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實為一大幸事。

這本論文集共收入論文九篇、作者 引言 一篇。韓南教授在 引言 中介紹說，這本論文集所討論的小說年代最早為一八一九年，最晚為一九一三年。這些論文集著重研究這一時期的中國小說史，著眼於三個主題：一是關於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中國小說家的技巧的創造性；二是西方人對中國小說的“介入”；三是關於二十世紀早期的寫情小說\*5。我不想沿著這三個主題泛泛而論，只想集中從兩個方面談一下我認為這本論文集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即他對近代小說研究所做的重要貢獻：一是他從敘事者的“聲口”研究“小說界革命”前的新小說及吳趸人的敘事者小說實驗；另一個就是他對近代翻譯小說和傳教士小說的考證和研究。

從韓南教授的近代小說研究的整體來看，他強調以往的近代小說研究過於忽略梁啟超的“新小說”之前的小說創作，而這一時期（即指十九世紀）的主要小說作品如



《花月痕》、《兒女英雄傳》、《海上花烈傳》、《風月夢》等不僅呈現了小說創作的旺盛局面，而且小說技巧特別是敘事方式的多種實驗也已經展開。他主張將這一時期的小說看作是新小說的先聲——即“新小說前的新小說”，並且對這些小說在敘事方式上的嘗試和創新給予中肯的評價。與以往的敘事學研究不同，韓南教授不是從敘事者的“視點”出發，而是從敘事者“聲口”這一獨特的研究方式切入，因而他發掘出了中國小說在十九世紀所具有的獨特內涵，以及敘事者的“聲口”是怎樣將傳統小說和近代的、甚至現代的小說聯結起來的祕密。

“小說界革命”前的敘事者聲口——一文是這部論文集最有份量的力作，被美國著名的漢學家、魯迅研究專家李歐梵教授稱為“開山之作”<sup>\*6</sup>。在這篇論文中韓南教授指出敘事者的“聲口”和“視點”是不一樣的，前者意味著敘事者的身份和性格，即“誰表述”，敘事者與作者和編者、讀者及文本的關係，他在怎樣的情況下敘述，向怎樣的聽眾，以及他對於所敘述的事件的態度、傾向和看法。後者意味著敘事者的“視點”，即“誰看見”，從怎樣的視點來看的，是全知的，還是限知的，是內部的還是外部的。如果從“視點”的角度看，那種限知的敘事直到一九一三年吳趸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之後——或者更嚴格地說是一九一六年的《禽海石》纔開始的。然而，從敘事者的“聲口”來考察，十九世紀的最好小說與以前的小說以及它們彼此之間在敘事上都有區別，甚至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他指出在《兒女英雄傳》、《花月痕》等小說中與舊式的佚名敘事者（傳統小說的一般說書人）不同的、具有鮮明的個人風格和獨立看法的新型敘事者——“個人化的敘事者”開始出現。其次，出現了“虛擬的作者”，即敘事者先將自己等同於作者，然後隱去自己而將寫作歸之於他人——另一個作者。如《風月夢》和《品花寶鑑》。再次，就是“最弱化的敘事者”和“親身介入的作者”出現。他認為《海上花列傳》是“弱化敘事者”的典型之例，而《花柳深情傳》、《海上塵天影》等小說則為“介

入作者”提供了例證。由此他得出結論：在梁啟超的新小說之前，這一時期的小說敘事已經開始了多姿多彩的變化，並形成了小說創新的第一次浪潮。

吳趼人是晚清小說家中最勤於小說文體實驗和技巧嘗試的作家。特別是在敘事者和敘事角度多重變化的實驗上，他既代表了新小說的最高水準，又呈現對十九世紀小說代表作的承繼和演變。吳趼人與敘事者 一篇從敘事的“視點”和“聲口”探討了吳趼人小說的獨特的創造性。他認為有些實驗被歸功於魯迅，其實吳早在二十年前就嘗試過。

韓南教授對近代文學這一領域的翻譯小說有著獨到的理解和考證研究。他對中國近代翻譯小說的研究所下的功夫之深，從他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推見。

中國近代的翻譯文學長期以來一直都是近代文學研究中最為薄弱的領域，其原因很多，不僅這一時期的翻譯作品數量繁多，且狀況複雜，很多作品至今不知原作書名和原作者是誰，重譯、轉譯的現象也很普遍。但研究者自身的原因可謂最大：一是外語不過關，二是功夫不到家。象韓南教授那樣下過深厚功夫 為調查一本翻譯小說的原作和原作者在浩如煙海的資料中求索和考證的研究者恐怕還不多，自然，也包括筆者自身。目前雖已有近代文學翻譯概論之類的書問世，但錯漏隨處可見，有些明顯的錯誤甚至讓人懷疑是否讀過譯本（還不指原著）。因而，當我讀到韓南教授這部分論文時，不由得心生敬意。

對翻譯的“直譯”和“意譯”，韓南教授有他獨到的看法。他指出：

所有的翻譯都是兩種文化語境之間的媒介，要想譯文以令人滿意的形式得到描述，兩種文化語境就都需要加以考慮。不同的譯文之間這一調和的表現區別頗大，正如我們通常使用的形容詞“直譯”與“意譯”所標明的那樣。（運用這些詞的麻煩在於，它們予人以存在某種絕對標準的印象。）譯文之間的差異一般都能用遊離於兩極間的總括性的詞語加以描述，即一極是對所有方面的保留，而另一極則是對所有方面的同化。吸收保留的意思是指譯者努力試圖復述 或至少是在可能的範圍內表達 原著的所有可辨的特徵。一般來說，他這樣做是由於他認為這些特徵對於真正的作品欣賞來說至關重要。同化的意思是指譯者對原文的改造，即將原文轉為一種普通讀者熟悉的形式。……大多數譯作都處於中間位置，介於完全保留與完全同化之間。\*7

用“保留”和“同化”來解釋兩種文化語境的轉換，頗有創見。正如作者所說，一方

面可避免用“直譯”或“意譯”這樣給人以絕對化印象的概念，而對於翻譯特別是翻譯初期的那種特有的翻譯狀況分析又非常適用。

論第一部漢譯小說，作者考證出近代第一部長篇翻譯小說《昕夕閑談》的英文原著書名和作者以及譯者，解決了近代翻譯小說研究中的一個久懸未決的疑案。

早期《申報》的翻譯小說一文對一八七二年五、六月間發表在《申報》上的三部外國短篇小說的中譯《談瀛小錄》、《一睡七十年》和《乃蘇國奇聞》進行了求索和考證，其中首次考證出《乃蘇國奇聞》源自馬裡亞特(Frederick Marryat)的《聽很多故事的把沙》(*The Pacha of Many Tales*)，而且對以上各篇都比照原文進行了“同化”與“保留”的詳細比較。同時，對原作者和原作的介紹也為我們更好地了解譯作的改動提供了參照。

中國十九世紀的傳教士小說對以往完全被忽略的十九世紀的基督教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郭實獵(Karl Gutzlaff)、詹姆士·理雅各(James Legge)、楊格非(Griffith Joh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傅蘭雅(John Fryer)等人的小說創作進行了疏理和考察。傳教士為宣傳基督教義創作和改編聖經為通俗小說(儘管其中有很多作品很難稱為小說)，並嘗試將中國傳統小說和西洋小說的形式和技巧結合起來，估計對當時的小說創作有可能發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特別是由李提摩太翻譯的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頭看紀略》(原名《回頭看，2000-1887》(*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和傅蘭雅倡導的“時新小說”對梁啟超的“未來記小說”創作和倡導的“小說界革命”產生的影響則不可低估。這一研究也可說為近代小說研究又填補了一項空白。

此外，本書中的另外幾篇論文，如陳蝶仙的自傳體愛情小說、《恨海》的特定文學語境、《風月夢》與煙粉小說等，也都是另辟蹊徑，發前人所未發之作。

如果按照不成文的慣例也給這本論文集挑點毛病，那麼，我想說的是，這本論文集應該注明原論文最初發表的時間和刊物，收入該論文集時作者對原論文是否做了改訂，以及做了怎樣的改訂。這對一般讀者來說或許並無太大意義，然而，對專業的研究者來說却是非常必要的。除了便於查找和核對原文外，還因惟此才能將它放在同一研究領域內進行橫向或縱向比較，確認它在整個研究鏈條中的位置。還有，作為學術專著如果在附錄裡收入“重要文獻參考書目”和“索引”<sup>\*8</sup>那就更為理想了。

其次，關於“文學語境”、“歷史語境”、“社會語境”和“文化語境”<sup>\*9</sup>的解釋，這幾個概念除“文化語境”外均出自《恨海》的特定文學語境一文，就選擇闡釋作品的角度而言，並非難以理解，但其解釋略嫌簡略。特別是“文化語境”一詞的解

釋顯得過於唐突，使人難得要領。原文為“本文的目的不僅是考證原著和譯者，而且要論述《昕夕閑談》作為譯本的特點。為了做到這一點，有必要按照小說原著的英語文化語境來看原著，同時按照《昕夕閑談》的中文文化語境來看《昕夕閑談》”。這是沒有甚麼問題的，接下來在括號裡又加了一段解釋：“‘文化語境’一詞，我指的是臆想中的讀者的期待，考慮到最寬泛意義上的風格流派，以及他的所有參照域”<sup>\*10</sup>。這段話中“讀者的期待”和“參照域”具體指的是甚麼？則令人費解。當然，問題也可能來自譯文。

另外，就是韓南教授在對十九世紀傳教士小說的考察中為何沒有提及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出現的由傳教士翻譯或改編的《伊索寓言》？儘管這些寓言並非屬於嚴格意義上的小說，但那些出自傳教士和合作者的“同化”而改編成中國式的寓言故事<sup>\*11</sup>，無疑對傳教士的自身小說創作和翻譯都產生過大或小的影響。作者是有意略去還是另有看法不得而知。

最後，在結束本文之前，我還想提及的是李歐梵教授為摯友（或可稱亦師亦友關係）韓南教授這本論文集所撰跋文——韓南教授的治學和為人。他在這篇情文並茂的文章裡回顧了他和韓南教授多年的學術交往和友誼，並對韓南教授這本論文集的重要研究成果做了鄭重推薦和畫龍點睛般的導讀。由此我們不僅可以了解到韓南教授的治學和為人，而且也能真切地感受到這兩位著名學者對學術研究的虔誠和執著，以及他們那種虛懷若谷、嚴謹求實的學風。文中有這樣一段話：“研究學問不可一蹴而就，必須一步一步地來，更不能好高騖遠，動輒以理論唬人——這是我從韓南教授處學來的淺顯道理”<sup>\*12</sup>。相信這段話對時下學術失範已亟、學風日趨浮躁的研究界來說可謂一語中的且意味深長。讀之，就像在炎炎的夏日裡迎面吹來一股涼爽的清風，使人為之一振：警覺或勉勵。

☐

#### 【注】

- 1) 韓南 (Patrick Hannan) 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國際著名的漢學家。1927年生於新西蘭，1949年畢業於新西蘭大學，1953年獲倫敦大學碩士學位，1960年獲倫敦大學博士學位。曾先後任教於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美國斯坦福大學和哈佛大學，退休前曾任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古典文學教授，兼主任，並擔當同大學 Victor S. Thomas 講座教授。韓南教授長年來主要研究中國古典小說，對近、現代小說也有精深的鑽研。他的專論《金瓶梅》探源 深受海內外學者的好評，被譽為這一領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1989年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他的《中國白

話小說史》。《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是他在大陸出版的第二本學術專著，這本論文集從古典小說和現代小說的接點上發掘近代小說的特質，從其獨特的敘述學“聲口”理論來解析以往被研究界忽略的處於古典小說“尾聲”階段（作者稱為新小說前的新小說）的小說，從傳教士創作的闡釋教義的小說和早期翻譯小說中探討新小說的成因和所受之影響，內容豐厚。可以肯定地說，這本論文集是近年來海內外中國近代小說特別是翻譯小說研究領域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 2 ) (美) 韓南著、徐俠譯《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
- 3 ) 韓南著、葉雋譯 談第一部漢譯小說，刊於《文學評論》2001年第3期“海外學人園地”，132-142頁。收入該論文集的 論第一部漢譯小說 應為同一論文，除了標題的一字之差外，文中譯筆表現和翻譯內容上的差異隨處可見。由於作者、譯者和編者在該書中沒有任何說明，只能從兩篇譯文的比較來看，似乎後者訂正了前者意思不通或明顯的錯譯，並且增加了更為詳細的注釋。前者的注釋共38條，後者則為95條，並且後者對原有的一些注釋還做了較大的修改和補充說明。如103頁注釋3，前者注釋只有5行約百字，後者則增加了約370多字。107頁注釋16，前者只有短短的一句話，而後者則增加了250多字。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斷韓南教授在收入論文集時對原論文進行了改訂和補充。
- 4 ) 詳見拙作“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編《中國文學報》第48冊，1994年4月。頁94-108。
- 5 ) 同2，頁1-8。
- 6 ) 同2，頁245。
- 7 ) 同2，頁110。
- 8 ) 這裡所說的“索引”指全書的總索引，包括書中提到的人名、書名和關鍵詞語等。
- 9 ) “文學語境”一詞見於該書《恨海》的特定文學語境一文，頁195-215。“歷史語境”和“社會語境”見於同一篇論文，頁196。“文化語境”見於 論第一部漢譯小說，頁102。關於“歷史語境”和“社會語境”在《恨海》的特定文學語境一文中是這樣寫的，“如果我們要考察這部小說的歷史語境，那麼我們應該將著眼點放在義和團暴動以及在義和團和外國軍隊戰鬥中身處京津兩地的南方人的困境方面。或者對社會語境的研究，應該強調小說所展示的城市與農村生活的區別，或官員與商人家庭的區別。”（見該書頁196）
- 10 ) 同2，頁102。
- 11 ) 例如，《萬國公報》1875年5月曾刊載伊索寓言一則，名為 失斧寓言（即今譯

樵夫與赫耳墨斯 )。篇幅不長，抄錄如下：“聞有節婦鄉居，家無擔石，賴子孝，採薪爲活。一宵值雨，晨不能樵，炊煙不起，無計可施。幸午霽，子亟入山，冀獲柴速售易米，供母晚餐。不期心急，舉斧過猛，迸落澗中，乃束手慟。忽來山人詰：何悲？告以故。曰：易易。吾當爲子求之。即入清波，執一斧出。子審視銀斧也，曰：非也，吾係鐵。山人下復舉一斧，則金斧者。子言非故物，曷敢認？後獲原斧乃謝受。山人喜曰：子孝且廉，貧無隔宿糧，臨財不苟，誠篤堪嘉。今將金銀斧聊佐堂上甘旨，子其勉之，拜領持斧歸。隣某聞之，典衣買斧，如法而行。山人果至，亦願代勞，赴水以原斧上。隣失望謾曰非。繼取銀斧，亦曰非。三取金斧，則曰是。山人大笑，曰：世間豈有金銀爲斧而樵者哉？爾誠貪詐徒，並鐵者不可得矣。言訖攜二斧去。隣無奈拾己斧，斧忽脫仍迸澗底，徒持木柄興敗而歸。”顯然，這篇寓言故事已經被完全中國化了，節婦和孝子的設定很有意思，特別是結尾處的改動，寫山人大笑，曰：“世間豈有金銀爲斧而樵者哉？”非常幽默，這在其他的《伊索寓言》中是見不到的。筆者在拙作“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中國文學報》第48冊，1994年4月）一文中有所論及。

12) 同2，頁242。

( LI Qingguo )